

近代中国的新学、宗族与地方政治

——以南昌熊氏家族为中心

李平亮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晚清民国时期，随着思想权势的转移和知识的转型，新式学历逐渐成为人们竞逐的目标。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精英为维持家族发展，获取新的社会权势，通过师承关系，将“新学”与家族的发展联成一体，创办新式学校，进行社会实践。这一策略不仅为其家族成员进入地方政治机构创造了条件，还形成了以学校为中心的政治权力网络，对地方社会的政治局势和权力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学术传承；新式教育；地方政治；熊氏家族；近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晚清至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的激荡下，近代中国在学术、思想、社会诸方面均产生了巨大变化。在此背景下，“新学”经历了一个由被排斥到接受再到受追逐的历史过程。在以往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中，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近代中国思想的历程¹、学术分科的演变²、学术的地缘与流派的关系³、以及思想与社会的互动⁴等问题作了极富创见性的分析，展示了一幅思想、学术与社会相互交融的画卷。但是，由于学术取向的限制，学者们对一种学术和思想潮流由何途径进入到具体的区域社会、它们又是如何在地方社会得到实践以及实践对地方社会产生的影响则论述不多。因此，为了深化我们对近代中国的学术与思想变化及其与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认识，有必要回到区域社会本身，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学术、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本文试以严复与南昌月池熊氏家族为中心，考察学术思潮与地方家学、学术传承与社会实践的内在联系，探讨学术、教育与地方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有助于进一步丰富近代中国学术、思想与社会的研究。

一、从“旧学”到“新知”

熊氏家族位于南昌县冈上乡月池村，因而又称为月池熊氏。据熊氏后人记载，该族乃是在唐后期安史之乱时，由江陵迁移入赣。至明末，该族的“定方支”一派迁居到现南昌县冈上乡西边一金姓村庄定居下来，成为南昌月池熊氏的祖先。

定居南昌后，为改变家族的不良境遇，熊氏子弟曾试图走科举之路，但直到清中期都未取得

1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2罗志田：《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刊《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3期，页107—114；

3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刊《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页24—41。

4有关学术、思想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罗志田先生取得了诸多创新性的成果。这些成果集中收录于《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学术与社会》，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其他相关研究参见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刊《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成功⁵。

先人在科场的失意和家中的贫寒，促使熊氏后辈走向了经商之道。经过两辈人的奋斗，熊氏家族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除在家乡经营盐铺外，熊家还在在汉口拥一个大规模的盐号⁶。同时，熊家还涉足典当业，分别在义宁、汉口拥有自己的当铺。至光绪年间，熊氏家族的经济实力达到一个鼎盛阶段。他们不仅加强宗族建设，还频频致力于地方公益活动⁷，

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熊氏又开始了对科名的追求。除出资捐纳一定的虚衔外，他们还向县考棚捐款。在“祀六乡倡始捐建考棚及增费于后者”的同善祠中，熊氏一族就有四人名列其中，分别是“通奉大夫月池熊理堂，通奉大夫月池熊詠和，通奉大夫花翎道衔月池熊谏和，通奉大夫月池熊世昌”⁸。此外，为了鼓励族中子弟治举业，熊氏还建立了“心远堂”，资助族中子弟从事科举之业。根据规定，熊氏子弟中举人者，可得银 700 两，中进士者得银则高达 3000 两，生员、贡生等亦有相应的奖励数额⁹。

心远堂的设立，为熊氏子弟专心治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们在府县两级考试中亦取得了一定成功。光绪十四年（1888）年，熊氏家族出现了第一位中举者。十年后，熊氏子弟熊光瓚高中夏同龢榜进士，熊氏家族获得其他各级功名的子弟亦日益增多。这一时期，由于捐纳的盛行，熊氏子弟也纷纷捐纳实缺和虚衔。通过正、异两途，熊氏家族在科举之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为更好地说明此一问题，现依据相关材料，将该族“位”、“育”、“正”三代成员获科名和曾任官职情况列为下表，以资参考。

表 1 南昌月池熊氏家族成员所获功名和官职表（位、育、正三代）

字辈	姓 名	功名或官职	字辈	姓 名	功名或官职
位	熊辉祖	庠生援例选庐陵训导	位	熊荣祖	附贡临江教授
位	熊绳祖	戊戌岁贡	育	熊育镛	湖北巡检
育	熊育镛	光绪十四年举人	育	熊褪	附贡湖北知县
育	熊元锷	光绪二十五年解元举经济特科	育	熊光瓚	光绪二十三年举人，二十四年进士
育	熊光瑶	附生新疆知府花翎盐运使衔	育	熊育锐	江苏嘉定知县升直隶州
育	熊占鼇	光绪十五年举人	育	熊育铎	附生
育	熊元练	廪贡生峡江教谕	育	熊元筠	癸卯进士
育	熊育鉉	湖南知县	育	熊育鎬	戊申岁贡
育	熊元隍	法部主事	正	熊正琦	光绪二十八年举人度支部主事
正	熊正琨	陆军部主事	正	熊正琛	江苏县丞蓝翎五品衔

5熊正仓：《熊氏起源和月池熊氏祖籍考》，手稿本，页 1。
6（民）吴宗慈：《民国江西通志稿·人物传·南昌县》，民国刊本，页 121。
7（民）严复：《熊禧祖家传》，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2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
8光绪《南昌县志》，卷十五，祀典，中，页 243。
9（民）严复：《熊禧祖家传》，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2 册，中华书局，1986 年。

正	熊正璐	广东县丞蓝翎同知衔		正	熊正瑗	法部主事
---	-----	-----------	--	---	-----	------

资料来源：光绪《南昌县志》，卷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选举；《民国南昌初年纪事》，卷八，职官。

上表表明，熊氏家族“育”字辈一代所获取的功名，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级别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代。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该家族科名鼎盛是在光绪中后期，而这时科举制度已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并最终于光绪三十一年被废除。换言之，科举制的困境，将会使熊氏家族通过治举谋求上升的策略受到了极大影响。这一点，也许能从该家族“正”字辈子弟获取功名较少的情形中得到印证。

科举制陷入困境之际，也是“新学”日益发展之时。显然，熊氏子弟也感受到“新学”的思潮，因而将目光由“旧学”转向了“新知”，并最终停留在严复的学术思想上。如熊元鶚，“少时即抱大志，不治举业，喜结交各地维新之士。……其后尽揽近人撰著译述言新法者，独膺侯官严复氏之说。以谓说渊览眇，根据道要，不为剽猎，偏曲蹇浅，犁然当人心，无如严先生者也”¹⁰；熊育钊，“读康南海、梁任公、谭复生诸先生所著书，憬然知旧学之不足专治，西洋学问之可贵。尤服膺侯官严几道先生，喜读其所译斯宾塞尔群学肆言，穆勒名学，以为士不读此二书，则无以知言”¹¹。熊氏兄弟对由治“旧学”转向严复学说，表明他们已经在为自己和家族的发展寻求新的途径。为实现这一目标，熊氏兄弟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先后与严复建立起师承关系，将自身和家族的命运与严复及其学说密切联系起来。

二、学术传承与社会实践

南昌熊氏与严复的交往，始于该族子弟熊元鶚。熊元鶚，谱名育鶚，号惠元，字季廉。少时即抱大志，不治举业，喜结交各地维新之士。1899年，熊元鶚得知曾任湖南巡抚的江西义宁人陈宝箴举家迁回南昌西山居住，即修书前往拜见，为陈宝箴器重，收为弟子。1900年7月，陈宝箴因病去世，熊元鶚往吊，得以结识陈三立。同年秋，熊元鶚与陈三立商量后，只身往沪，拜见因避乱而滞居上海的严复，行弟子礼，并改字师复。关于熊、严两人见面的经过，严复本人有如下回忆：“秋，季廉至海上，先以书自通，继而执贽造吾庐，求得著籍为弟子。丰采玉暎，言论泉涌，灼然知为非常人也。叩其学，经史而外，历举明张太岳、王船山以对。讲道论学，相得甚欢”¹²。

自沪南归后，熊元鶚大力宣扬严复的学术及思想。如当时的《大公报》报道：“侯官严又陵观察之学融贯中西，理见其极，有识之士莫不推为‘支那第一流人物’。江西自熊君季廉等极力表彰，知者渐众，如《天演论》、《严氏丛刻》有能成诵者。”¹³。此外，为对西学有更深入的理解，熊元鶚又开始学习西文，并通过书信向严复请教学习之法。在回信中，严复多次鼓励其坚持学习，认为即使文法偶有不通，亦不影响其对“西文”的学习¹⁴。同时，为帮助熊元鶚学习英文，严复特应其之请，写成《英文汉诂》一书¹⁵。

与严复的交往，不仅使熊元鶚的西学知识有了增进，且让其性情也发生了变化。陈三立曾这样描述其转变：

10（民）陈三立：《南昌熊季廉墓志铭》，见《散原精舍诗文集》，文集，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847。

11熊正理：《监察院监察委员本生显考熊公纯如府君行状》，《革命人物志》（台北），第十集，页528。

12（民）严复：《熊生季廉传》，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

13“严学大昌”，《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第四十六号。

14（民）严复：《与熊季廉书》，见《严复未刊书信选》，载《近代史资料》，总104号，2002年，页56。

15（民）严复：《与熊季廉书》，见《严复未刊书信选》，载《近代史资料》，总104号，2002年，页58。

于是君年二十一，过谋密友陈三立，孤身走上海，执贽严先生门下，……君之学亦日邃而月变矣！当是时，天下方多事，后生少年猖狂睢，异说蜂起，嚣杂靡一世。即君初时，盛气发愤，亦颇激昂，用高语惊座人。至是愈惩其害，研口极变，敛抑锋锐，归之大适。¹⁶

“新知”的增进，使熊元锷在改革后的江西恩科乡试中一举高中，成为江西历史上最后一名解元。熊元锷的成功，让严复异常欣喜，认为“江右乡榜得佳卷如公，以冠多士。此不独征鉴衡者之识力，实以见吾国学界行已振聵发蒙，有拨云见天之望”¹⁷。但是，令严复没想到的是，1906年初，熊元锷因操劳过度而患肝病去世。对于熊元锷的去世，严复深为痛惜。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严复将其称为“生平第一憾事”，列为中年“最为悼痛”之伤。

熊元锷去世后，严复仍密切关注熊氏其他子弟的学业。在与元锷之弟元整的通信中，严复仍是鼓励其致力新学：“八弟年齿甚富，但肯努力，无忧学之不成。正面当以英文、算学为入手致力之事，暇而还读我书。”¹⁸此后，随着元锷堂兄育铎与严复的结识，熊氏家族与严复的关系更趋密切。

熊育铎，字纯如，号仪炳，早年曾拜萍乡名宿贺国为师，并从贺游学数年。¹⁹在游学的过程中，熊育铎逐渐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于是“憬然知旧学之不可专治，西洋学问之可贵”，并极力推崇严复的学术思想和社会理念。在其族弟元锷去世后，熊育铎成为维系其家学与严复学说关系的纽带。宣统二年（1910）年，熊育铎以江西教育总会副会长的身份参加了学部召集的会议，得以见到严复，并亦行弟子之礼。

与严复结识后，熊育铎经常通过书信向严复请教各种学术、政治、时事问题，而严复也是有信必复。如严复自己就说：“不佞平生答复友人书札，唯于吾弟为最勤，此非有所偏重于左右也。”²⁰但是在两人的通信中，谈论最多的是对新式教育的认识和看法。例如，在关于中学课程应仿照何种形式的问题上，严复对熊育铎的看法深表赞同：“来教谓中学课程宜仿德制，分文实两科，鄙意亦深以为是”²¹。在给熊育铎的回信中，严复多次重申教育对于当时社会的重要性，认为其是救国之根本，鼓励熊育铎积极从事该事业：“根本救济，端在教育，此即足下今日所勤从事者，故曰‘可钦羨也’。”²²此外，严复还不时强调，“教育两字，虽亡国亦不可无，不可不加意也”。²³

在与严复频繁的讨论过程中，熊育铎逐渐接受了“教育救国”的理念和思想，对新式教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积极投入到实践中去。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心远中学的历史中。心远中学的前身为“乐群学堂”。1901年，熊元锷与其兄育铎、育鎬，以及新建任夏敬观、蔡公湛、高安人邹叔忱等人，共同组织了一新式学堂——乐群英文学塾。该学塾主要以研讨西洋实科及语言为主，陈三立曾以“插架琳琅百国书，旁形文字相于喁”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其特点。科举制度废除后，因部分创办者先后离开，乐群学堂改由熊氏家族私人经营，并改名为私立心远学堂。有关以上变更，近人黄炎培有如下记述：

私立心远中学堂，清光绪二十七年创办，堂长熊育铎。地点开始在城内东胡边平远山房，为熊氏私产，现已建筑新校舍于省会三道桥憩云庵。此校动机始于光绪二十七年熊元锷（光绪癸卯科解元）及熊育铎兄弟，受严几道先生之熏陶，为高足弟子，在省创

16（民）陈三立：《南昌熊季廉墓志铭》，见《散原精舍诗文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847。

17（民）严复：《与熊季廉书》，见《严复未刊书信选》，载《近代史资料》，总104号，2002年，页62。

18（民）严复：《与熊季贞书》，见《严复未刊书信选》，载《近代史资料》，总104号，2002年，页80。

19熊正理：《监察院监察委员本生显考熊公纯如府君行状》，《革命人物志》（台北），第十集，页528。

20《与熊纯如书》，第39封，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书信，中华书局，1986年。

21《与熊纯如书》，第81封。

22《与熊纯如书》，第57封。

23《与熊纯如书》，第10封。

办英文学塾。至二十八年，改为乐群学堂。育铎为堂长，**镌**划一切。捐资赞助人蔡可权，熊正璠、夏敬观、邹凌沅、张浩等。至三十年，改称熊氏英文学塾，费用由熊氏捐助。至三十一年，停科举，乃改称南昌私立心远中心学校，向官厅立案。²⁴

可见，自科举制废除后，心远学堂从校舍、经费及主要管理人员，都是熊氏家族一体承担，成为名副其实的私立中学。进入民国后，学校又更名为“南昌熊氏私立心远中学校”，熊育铎任校长。在主持心远中学的时间里，熊育铎将严复倡导的新式教育的思想与理念，贯彻到该校的学科设置、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以及学风等诸方面，使心远中学成为国内最著名的中学，与当时的长沙“民德中学”、天津“南开中学”并称为国内三大私立中学。

新学初兴之际，江西境内的许多新式学堂科目并不完备，大多仍旧以经学国文为重，很少学堂开设英文与算学的课程。而熊育铎接手心远学堂后，不仅继承了乐群英文学塾的特点，将英文与算学作为教学之重点，且对其他学科也作了完善。如《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其时各校科目不甚完备，除心远中学注重英算外，余多注重经学国文，毕业生准用顶戴。²⁵”而江西学务处在调查的报告亦说：“查此堂学科大致完备，其西文算学成绩尤良，将来各种科学如能与西文一律进步，则成绩更佳。²⁶”民国以后，虽然各中学纷纷设立英文课程，但由于心远中学在许多课程教学中使用全英文教材，因而该校学生的英文水平仍远远超出各校学生。如曾在洪都中学就读的程天放刚转入心远时，老师写出的英文有一半不认识。至毕业时，程天放则可以用英文参加征稿并获奖²⁷。

在注重知识培养的同时，心远中学还着力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在物理、化学等课时安排上，实验的时间每周都有半天，且连续三年不间断。此外，为紧跟当时各种新的技术，心远中学每年都拿出一大笔资金，购买新的实验仪器。当时省督学在该校视察报告中就说：“（心远中学）理化仪器，博物标本，均有相当设备，而尤以理化设备较完。且另有实验室二处，布置均堪适用，实为本省私立学校设备之冠。²⁸”

在学风的管理和建设上，心远中学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会的建立等各种活动。如熊育铎在为校刊所写的一篇序文中说道：

学会之设，无校无之，于日本学校中尤见发达。盖一国之强弱，视国民之职能为差。愿诸子于课余牺牲游息时间，以办会务。苟能群策群力，亦将无事不举也。在校能如此，集成团体，则他日入身社会，亦犹如是也。²⁹

在熊育铎的倡导下，心远中学不仅建立起全校性的学会组织，且各年级亦建有自己的学会，并创办了校刊——《心远季刊》，演剧、体育等活动在心远也时有开展。

最后，心远学校的成功，与其拥有较优秀的师资也是分不开的。在学校发展之初，熊育铎就曾写信给严复，希望在师资上得到帮助。为此，严复专门将其北洋水师学堂的弟子李幼堂、陈持正举荐到心远学堂任教。进入民国后，在心远中学的所有教员中，除国文教员外，其他课程的教员都有新式学校的经历。其中四名毕业于北京大学，三名为日本留学生，其他的也都是各种高等师范或高等专门学校毕业³⁰。

在熊育铎的潜心治理下，心远中学的教学水平在众多的公、私立中学中一直位居前列，

24（民）黄炎培：《清季各省兴学记》，见沈云龙主编：《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辑（651），页179—180。

25《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1935年，转引自薛隆基：《熊育铎与月池熊氏——从家族到社会》（内部刊物），南昌，1989年，页41。

26“江西江西省城私立心远中学堂调查意见”，上海：《东方杂志》第六期，教育，页120。

27程天放：《程天放早年回忆录》，台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页17—20。

28“省督学视察私立心远中学报告”，见南昌：《江西教育旬刊》，第4卷5—9期合刊，页1。

29心远中学编：《心远杂志》，第二期，页221。

30“本校教职员一览”，《心远杂志》，第二期，页259—260。

其学生在各类考试中的成绩亦是出类拔萃。民国元年，江西省政府举行选派学生出洋留学的考试。在选拔考试中，心远学生一支独秀，占据了大半数的名额。据说，由于中选考生以心远毕业生居多，以致李烈均在接见学生时常常问起“是否毕业于心远中学”³¹。

心远中学学生在各类考试中的出色表现，不仅使得省内众多家庭将子弟送入该校学习，也吸引了许多外地家庭的子弟。从该校学生的家庭背景看，他们大多都为家境较富裕的士绅子弟，这一点从“心远的少爷”这一俗语中得到印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进入心远中学已经被人们视为向上升迁的重要途径。

除接管和主持心远中学外，熊育钫及其家族成员还创办了私立心远小学，并取得相当出色的成绩。据称，在由小学升初中时，该校的学生几乎能考入任何中学校，许多省内著名的中学，也都愿意接受心远小学的毕业生。1932年，在全县私立小学评级中，心远小学成为全县两所获得特等的小学之一³²。此外，鉴于当时江西尚无一所综合性大学，熊育钫曾在心远中学的基础上，于1922年创办了江西第一所私立综合大学——私立心远大学，初设文科，后增设理数二科。熊育钫亲任中文系主任，并延聘一批毕业于国内外大学之士为教授，一时颇有成就。1926年，教育部派员视察该校，准许立案，教育总长章士钊特划专款一万元，以示奖励³³。

民国时期，在主持上述三所私立学校的同时，熊育钫还一度任江西女子公学校长和省立第二中学校长。自熊育钫任职二中后，该校的校务蒸蒸日上，“名称永居第二位，成绩须达最高峰”成为该校的追求。时至今日，省立二中（现称南昌市第二中学）的教学仍在全省中学中名列前茅。

总之，秉承严复“教育救国”的思想和理念，熊育钫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绩，成为近代江西教育界的泰斗，被誉为“中国的福泽谕吉”。教育上的成功，不仅为熊育钫个人带来声望，也为熊氏家族及社会培养出一大批新式人材，从而进一步为熊育钫个人和熊氏家族带来了更多的、可资利用的社会文化资源。在教育与政治密切结合的特定时代背景中³⁴，这些资源又与其他的因素结合，深刻地影响着地方社会的政治结构。

三、新学与政治

清末以降，随着新式学历成为科名的唯一替代者和教育行政的地方化，教育也逐渐与地方政治结合为一体。至民国时期，许多学校甚至成为各政治派系竞逐地方权力的场所³⁵。在此一背景下，熊育钫与其家族成员也不断地进入到地方事务中来，并在地方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自光绪三十三年始，熊育钫开始担任地方公职，身份为南昌县教育会副会长，后又当选为江西省教育会副会长。宣统二年，凭借在教育界的威望，熊育钫当选为南昌城自治会总董。民国元年，熊育钫出任南昌县自治会议员。除在城、县两级自治机构中任职外，熊育钫还组织了南昌县教育款产保管委员会，并一直担任主席一职³⁶。

31（民）胡先骕：《敬悼熊纯如先生》，上海：《民国日报》，1943年1月23日。

32薛隆基：《熊育钫与月池熊氏——从家族到社会》，页38。

33薛隆基：《熊育钫与月池熊氏——从家族到社会》，页38。

34如闽人林传甲就曾这样评论：“江西教育界，次第被选为省议会议员，占省会之多数。教育界之领袖，乃进而为省议会之领袖。”见（民）林传甲：《大中华江西省地理志》之《江西人民之省议会》，民国七年刊本。

35（美）Stephen C. Averill：《EDUCATION, POLITICS AND LOCAL SOCIETY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刊《民国研究》，第3期，页18—62。

36“南昌县教育款产保管委员会委员一览表”，见南昌县教育款产保管委员会编：《南昌县教育款产保管委

继熊育钫之后，熊氏其他子弟也在各级政治机构占据了不同的位置。在宣统二年冈上乡自治会选举中，熊育钫当选为副议长。民国二年，熊正璠、熊正琦两兄弟均成为众议院议员。民国五年，熊季贞担任了南昌县农会会长一职。熊氏另一名弟子熊元镗不仅曾任城自治会名誉董事，还长期担任江西省总商会协理一职，并在南浔铁路路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³⁷。

随着熊氏子弟在地方各级政治机构崭露头角，许多心远、二中的教员与毕业生亦进入到全省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在南昌、甚至整个江西教育界形成了著名的“心远系”。其主要人员有：程时燧，原心远教员，1916年任省立一中校长；欧阳祖经，心远教员，1919年任省立一中校长；张来仪，心远教员，继熊育钫后任女子公学校长；柳藩国，心远中学监督，后人省教育厅普通科科长；李中襄，心远毕业，继熊育钫任心远中学校长；车驹，二中毕业，后任二中校长；李右襄，心远毕业，省立公专校长、省立甲种各业学校校长；陈颖春，心远毕业，后任省立一中、国立十三中学校长；廖正，省立九江中学校长；肖赣，萍乡中学校长；胡昌琪，心远中学教务主任，省教育厅中等教育科科长、万文生，二中毕业，省教育厅督学³⁸。

“心远系”形成后，为争夺各种资源，即与当时南昌教育界的另一派别——“宋育德派”发生了一系列冲突。1919年3月，由于会长任职期满，江西教育总会举行了正副会长改选，熊育钫与宋育德等人参加了会长的竞选。在此次选举中，宋育德以较大优势击败了熊育钫，当选为会长³⁹。

除竞选会长一职，双方还试图通过种种手段，以达到瓦解对方对学校控制权的目的。如曾就读于二中的徐先兆后来就回忆说：

1920年夏天，学校快放暑假时，学校忽然发生风潮。问题不大，原本容易解决。可是当时南昌教育界有熊、宋两派，以学校为地盘，互相争夺。二中是熊派，宋派便收买我校的几个坏头头，从中煽动，竟闹到要求退膳退学的地步。⁴⁰

除与宋派争夺教育行政控制权外，熊育钫及其所在的学校亦卷入到各种政治运动及党派斗争中。1915年，为替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杨度、刘师培等人在北京成立了“筹安会”，主张君主立宪。在各省，则是成立“筹安分会”，组织签名劝进活动。当时江西教育界的一些领导者也纷纷在劝进书上签名，而熊育钫则明确拒绝。对此，曾在心远就读的张国焘在回忆录《我的回忆》一书写道：

在签名劝进的闹剧中，有的为权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有的趋炎附势，甘心附逆。我们的校长熊育钫先生独不顾危险，拒绝签名劝进，真是难能可贵。我和一般同学们看到这些丑剧都为之齿冷，对熊校长的义不帝袁大家一齐颂扬，纷纷竖起大拇指说：‘熊猴子毕竟要得’。⁴¹

1919年5月，心远、二中学生为声援北京“五四”运动，准备上街游行请愿。为防止学生遭受当局的镇压，熊育钫特找到江西督军陈光远的幕僚，请其代为疏通。1920年4月，当熊育钫旅沪时，当局以闹学潮为由，开除了心远学生刘人龙。5月，熊育钫回到南昌，闻知此事，即为其恢复学籍。1921年元旦，江西最早的革命团体“改造社”在二中成立，领导者为二中学生袁玉冰、黄道等人。5月，改造社出版发行社刊《新江西》。此后，心远中学与心远大学一同成为江西党团组织重要的活动中心。1923年3月，由袁玉冰等人发起的

员会三年来总报告》，页3，1923年。

37《民国初年南昌纪事》，卷七，选举。

38薛隆基：《熊育钫与月池熊氏——从家族到社会》，页57；上海：《申报》，1919年7月23日。

39“教育会选举会长”，《申报》，1919年3月20日。

40徐先兆：《袁孟冰和改造社》，见共青团南昌市委编：《南昌青年运动回忆录》（内部刊物）南昌，1981年，页21。

41张国焘：《我的回忆》，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年。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心远中学成立。1923年4月19日，在心远中学发起下，南昌城内中等以上学校3万多学生举行集会游行，要求政府取缔“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心远中学学生王际云被推为临时主席，主持大会，组织游行。1923年10月，南昌共青团地方组织将第三支部改设于心远大学，委该校学生朱大贞为支部书记，同时吸收心远中学学生饶漱石为共青团员⁴²。

1924年，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成功，熊育钫亦开始改变不入党派的原则，加入国民党。1926年，在心远、二中学校大会上，熊育钫向全校师生发表演说，声明自身入党之缘由，同时动员他们加入国民党⁴³。在熊育钫的劝说和动员下，心远、二中教员的“中坚分子”全体加入国民党。一份1929年的资料表明，在当时心远中学33名教职员中，国民党党员就有29人⁴⁴。此外，在熊育钫的引导下，他的许多学生也加入了国民党，并成为江西党部的骨干，逐渐形成了遍布江西省县国民党机关的颇具影响的“心远系”。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委兼宣传部长程天放、国民党江西党部农民部部长的王礼锡等。

随着众多心远出身的人加入国民党，熊育钫在国民党江西党部的地位陡然上升。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江西省临时省政府成立，熊育钫被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委任为临时省政府委员。1927年1月，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熊育钫被左右两派同时推举为省党部执行委员。但是，由于选出的执委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居多，导致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段锡朋和右派不满。因此，他们另拟出一份党部执委名单，并成立监察委员会，推举熊育钫任监委主任。4月2日，由于段锡朋等人对共产党和左派的迫害，中共江西区委发动了打击段锡朋控制省党部的斗争，熊育钫、程天放等人在这次事件中先后被抓入狱。1927年8月，国民党开始所谓的“清党”，熊育钫被任命为江西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兼代省党部组织科长。

熊育钫及“心远系”在江西各种政治生活中的强势地位，引发了熊育钫与江西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之间的冲突。1929年，鲁涤平接替朱培德为江西省政府主席，熊育钫虽任省政府委员。由于鲁涤平忌惮熊育钫在政府中的势力，因而对其极力排挤，并以“通共”的罪名逮捕心远中学教员数人，迫使熊育钫离开南昌前往南京。鲁、熊之间的紧张关系，后经谭延闿调解方得到缓和。鲁涤平在离赣期间，还曾委任熊氏代理省政府主席。

熊育钫在省政府地位的恢复和提升，为其将更多的门人弟子插入各级权力机构提供了便利。在熊育钫的大力举荐下，其学生龚师曾、李中安分别就任南昌市市长和南昌县县长。但是，正当熊育钫及“心远系”的势力得以恢复之际，熊式辉入主江西，开始了“建设新江西”时期。为在江西培植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建立自己的政治关系网，熊式辉依靠其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关系，对熊育钫和“心远系”采取了极力打击的政策。在此情势下，熊育钫不得不再次离开南昌，前往南京任检察院监察委员。此后，熊育钫虽每年都回到南昌，但只是料理心远中学的事务，不再干预地方政局，直至1943去世。

四、结 语

42共青团南昌市委编：《南昌青年运动回忆录》，1981年，页32；共青团南昌市委编：《南昌青年运动三十年：1919—1949》，1984年，页11—20；薛隆基：《从家族到社会》，页65—66。

43熊正理：《监察院监察委员本生显考熊公纯如府君行状》，《革命人物志》（台北），第十集，页525。

44《心远中学教师名单》，民国十七年，该名单现存南昌二中校史陈列室。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社会不仅在思想上经历了“从西学不能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的权势转移过程，且在知识和制度体系上也发生了转型⁴⁵。这两个历史过程虽在转变的时间和方式上各有不同，但我们还是看到，两者并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时有交织，绕为一体。思想权势转移，集中体现在人们对新学态度的转变上，即由排斥到接受再至追逐。而知识与制度体系的转型，也离不开新式教育这一载体。在过去，对于清末民初新式教育大兴这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通常被视为“新学”广泛传播的重要表现和必然结果。原因很简单，没有新学的广泛传播，新式教育无从谈起。接受新学是新式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应该说，在许多场合下，“新学”的传播与新式教育之间的关系并非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一方面，“新学”的传播，并不一定直接导致新式学堂数量的增多；另一方面，新式学校设置的动因、时机以及各学校之间的竞争关系，也无法单纯用“新学”的传播来解释。为解释新式教育的发展，除了追究思想上的原因外，我们还必须寻求社会的或地方政治方面的解释。

严复与南昌熊氏家族的个案表明，在废科兴学这一时代背景下，为了维持家族的发展，巩固自身在地方社会的权势，熊氏家族开始积极寻求新的“文化资本”，并最终将目光投向了新式教育。作为族中的精英人物，熊元锷、熊育钊以敏锐的洞察力，先后与“新学”的代表人物严复结成师承关系，在将“新学”思想与家族的发展联成一体。凭借家族原有的经济实力，熊育钊得以继续将新学思想付诸时间，并取得了巨大成功。通过创办“心远中学”和经营其他新式学校，熊育钊为本族培养了众多接受新式教育的子弟。借助新的“文化资本”，熊氏子弟不仅进入到镇、县、省地方各级政治机构，还形成了以“心远系”为中心的政治权力网络，一度左右着地方社会的政治局势，深刻地改变了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

需要说明的是，当然，从本文个案所见的家族、学术传承与地方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并非限于一时一地的特例。应星、章清、艾尔曼、Edward McCord、Stephen C. Averill等人在他们各自的研究中提供了相关例证⁴⁶。当然，这并不是说本文的结论适用于其他地区或家族。笔者的意图在于指出，绝不能将严复与南昌的熊氏家族的情况视为例外，因为学术与社会权势、教育与地方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其他地区、其他家族的历史中也同样可以看到。因此，如何在近代学术史、思想史与社会史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框架，也是我们在今后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The Academic transmiss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al power in the late Qing and the Republic

—A Case on Yan-fu and The xiong's lineage of Nanchang

45 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辑于《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997年11月）。出版社？

46 应星：《社会支配关系与科场场域的变迁——1895—1913年的湖南社会》，收录于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刊《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美）艾尔曼：《经学、政治与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美）Edward McCord：《Local Military Power and Elite Formation: The Liu Family of Xingyi County, Guizhou》，收录于《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C]，EDITED BY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美）Stephen C. Averill：《EDUCATION, POLITICS AND LOCAL SOCIETY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刊《民国研究》，总第3期。

Li Pingli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Jiangxi Nanchang 330022)

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and Philosophy, people vied in the pursuit of new academic degrees in the late Qing and the Republic. Under this background, some local elites connected “the new academic”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own lineages, by building the academic transmission and establishing new style schools. Their success on the new style schools, not only provided new historic opportunities for the family's participated in the local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but also built up the political net centre on the schools, which had a profound historical impact on the local government.

Key words: Academic transmission; the new style schools; Local government; Yan-fu and The xiong's lineage ; The late Qing and the Republic

收稿日期：2006-12-21

作者简介：李平亮（1974-），男，江西进贤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